

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进程

杨 涛 盛柳刚*

摘 要 本文从区域劳动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城市间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融合。我们介绍了分析区域劳动力市场的理论框架与国际经验,并利用住户调查数据发现,1988—1995年间,随着工资和教育回报率的上升,它们在城市间的差异有所扩大;虽然区域间的工资收敛并不显著,但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工资收敛速度快于受教育程度高的技术型工人。针对这些实证结论,我们提出了促进区域劳动力市场统一的配套改革措施,以及建立全国性的以身份证为核心的大学生就业市场的建议。

关键词 区域劳动力市场,教育回报,工资收敛

一、引 言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劳动力的结构布局和行业分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78年,绝大部分劳动力滞留在国有企业和农村公社中;到90年代末,大约1/3的农村劳动力已转移到非农经济中,大约3/5的城镇劳动力在非国有企业里就业;目前,大约有一亿农民工进城务工。劳动力流动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世界银行(1997a)研究发现,1978—1995年之间,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流向高生产率的非农产业,对年均9.4%的GDP增长率的贡献占到了1.5%。蔡昉、王德文(1999)在此基础之上考虑了区域间劳动力的转移,发现改革以来GDP的高速增长中有21%来自于劳动力的流动。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但是,区域间的劳动力市场是否出现了整合?区域间工资是否出现了收敛?已有的研究侧重城乡间劳动力的流动和收入差距,而忽视了对改革过程中城市间劳动力市场的静态特征和动态演变过程的研究。本文有两个研究目的:第一,介绍西方区域劳动力市场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第二,利用这一方法研究中国改革过程中城市劳

* 杨涛,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经济系,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盛柳刚,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经济系。通讯作者及地址: Dennis Tao Yang,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 3033 Pamplin Hall (0316), Blacksburg, VA 24061, USA, E-mail: dyang@vt.edu; 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舜德楼南101, 100084。Wilson Sheng,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 3033 Pamplin Hall (0316), Blacksburg, VA 24061, USA, E-mail: sheng@vt.edu。本文系作者于2006年夏季访问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期间的研究成果。作者感谢参加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讨会的人员所提出的有益建议,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当然,作者对文中所有错误和遗漏负责。

动力市场的发育和融合过程。

区域劳动力市场(local labor market)是劳动经济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它试图描述和解释不同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就业、失业率、劳动力流动等主要指标的截面差异和动态演变路径。一个经典的模型是 Topel (1986) 提出的动态区域均衡模型,其核心思想是,如果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个人将选择到未来收入折现值最高的地区就业,那么区域间同质劳动力的工资差异就会由于劳动力自由流动而缩小。¹ 他发现美国各州工资率对州际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很敏感,而且不同流动性的劳动力群体工资弹性不同。Blanchard and Katz (1992) 通过分析美国各州的就业人口增长率、失业率的动态路径进一步发现,在美国区域劳动力市场受到外部负面冲击之后,劳动力流动是区域劳动力市场重新回到均衡的主要调整机制。Borjas (2001) 发现,最具有流动性的墨西哥移民加速了美国州际间工资收敛的速度。

区域劳动力市场经济学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分析中国改革进程中城市间劳动力市场的静态差异,理解市场融合和发育的动态过程和均衡机制。如果同类劳动者跨区域的工资不断收敛,则说明劳动力市场的效率有所提高,反之,如果存在抑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则会造成劳动力市场的分隔,阻碍生产要素价格的一体化。目前从区域劳动力市场的视角分析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研究比较少,本文旨在抛砖引玉,指出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并补足我们对改革进程中城乡移民、劳动力部门间流动的认识。

为了考察改革进程中区域间劳动力市场的融合程度,我们至少需要两个时点的数据。因此我们采用了中国社科院和西方学者共同收集的 1988 和 1995 年的两次城市住户调查(CHIP)数据。数据来自 10 个省份多个城市,1988 年含 67 个城市,1995 年含 62 个城市,其中有 29 个城市为两次调查覆盖,因此组成了一个两年的城市面板数据。我们的重点是分析城市间工资差距和教育回报率的截面差异,并分析在这一时期内城市间工资收敛和教育回报率的分布状况。

我们采用明瑟收入函数估计了样本中各个城市普通劳动力真实工资水平和教育回报。数据显示平均真实工资在这一期间上升了 40%,平均教育回报也由 3.5% 上升到 5.4%。实证结果同时表明这两个指标的城市间差异几乎扩大了一倍,这说明在中国并没有出现各城市间要素价格均等化。另外,我们利用收入收敛模型,分析了 29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得到与国际经验不同的两个结论:第一,发达国家区域间劳动力市场虽然收敛速度较慢,但收敛是显著的,而中国尽管劳动力市场改革成效显著,已有相当规模的劳动力流动,但是收敛并不显著。第二,在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般具有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劳动者流动性比较大,市场融合度高,而中国则不同。从收敛系

¹ 由于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比较高,因此主流经济学中的“区域”主要是指城市之间。在 Topel(1986)一文中,“local labor market”也有局部或本地劳动力市场的涵义。

数来看，各城市间受教育水平较低的非技术工人的收敛速度是受教育水平较高工人的两倍，这说明中国受教育水平高的劳动力流动性反而比较差。

我们认为，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存在分割迹象主要来源于抑制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区域封闭的户籍制度以及附着于户籍制度之上的本地居民优先的就业政策、社会保障和教育培训机会、难以转移的养老金、住房管理体制以及形形色色的地方保护。我们探讨了这些制度障碍的原因和未来改革的方向，并针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流动性差的现象，提出了一个政策建议——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学生就业市场，尝试用身份证取代户口本，取消住房、养老金、教育培训机会等与户口的挂钩，帮助这部分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就业人口摆脱诸多制度的约束，并逐步推广，以期最终取消户籍制度。

文章第二部分介绍了区域劳动力市场经济学的一般分析框架，以及对研究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启示和意义；第三部分描述了两次城市住户调查的数据，包括城市 and 个人的特征；第四部分估计了城市间的工资结构和教育回报，以及七年间工资的收敛状况；第五部分讨论了中国区域劳动力市场分割背后的制度原因，探讨了未来改革的方向；第六部分提出并讨论了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学生就业市场的建议。

二、区域劳动力市场经济学的方法论

区域劳动力市场经济学 (local labor market economics) 既研究局部劳动力市场的工资确定、就业、失业率、劳动力流动等的截面差异，也分析这些变量在区域劳动力市场间的动态演变路径。作为劳动力经济学的一个领域，它强调局部劳动力市场的特征对整体劳动力就业和工资的区域分布的影响，而且力图解释外生冲击发生之后区域劳动力市场的调整机制。

国内比较熟悉的区域劳动力市场经济学的一个视角是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研究。Barro and Sala-i-Martin (1991, 1992) 开创了研究区域间人均收入收敛情况的先河。² 他们的研究在新古典经济增长基本模型中边际递减假设之上，将跨国人均收入收敛的研究方法应用于一个国家或者共同体内各个区域的人均收入收敛研究。他们发现，1880—1988 年美国各州和 1950 年以来的西欧 73 个地区间都存在着人均收入收敛的情况。虽然收敛的速度是缓慢的，年均约为 2% 左右，但是统计上是显著的。同时，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对条件收敛速度的贡献率达到 1/3 左右。

许多学者按照这一思路检验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省区之间的人均 GDP 和人均收入的收敛情况，Jian *et al.* (1996) 发现，80 年代人均收入明显收

² 他们研究的是人均收入，而不是工资本身。本文不特意区分工资与收入的差别。

敛,但从1990年开始,各地区的收入差距开始扩大。林毅夫等(1998)研究发现,1978年以来人均GDP差异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内部减小,而东中西部地区间的差异却在扩大。蔡昉等(2001)发现劳动力市场的扭曲影响中国地区间经济增长的条件收敛。刘强(2001)的研究结果显示,大规模劳动力的区际迁移是中国地区间经济增长收敛的重要诱发因素。

收入收敛研究视角可以说明贫穷地区是否能够比富裕地区发展得更快,以及哪些因素会影响地区间的收敛。但是,这一视角无法解释局部劳动力市场在工资、就业、失业率和劳动力流动之间的巨大差异,也无法解释区域间劳动力市场特征对工资等变量在区域分布上的影响。Topel(1986)的动态区域均衡模型则为我们从微观上分析这些问题提供了一般性的分析框架。

动态区域均衡模型试图分析各地区劳动力市场特征及其演变对整体劳动力就业和工资的空间(地理上)分布的影响,这些特征包括各地区的失业率、工资与收入、劳动力净流入和经济增长等因素。其核心思想是,如果劳动力允许自由流动,个人将选择到未来收入贴现值最高的地区就业,那么区域间的同质劳动力间的工资差异就会由于同质劳动力自由流动而缩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考察劳动力市场的特征对就业和工资的影响。第一,各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差异和演变将引起工资调整和劳动力的流动;第二,当一个外生冲击影响一个地区的劳动力需求时,该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就会根据区域的特点进行调整,使之重新达到均衡,其中劳动力流动和工资的动态调整路径是我们感兴趣的课题。

Topel(1986)利用美国1977—1979年的现住人口调查(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s)数据发现,工资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没有弹性,相反,工资率对各地区(州)的劳动力市场差异很敏感。一个对某地区的外生正冲击将增加该地区的劳动力需求,从而提高工资率。然而预期未来收入增加时,由于外地劳动力的流入,将会导致当前工资率的下降。这样就有必要区分冲击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当外生冲击是短期时,由于预期未来收入不会上升,外地劳动力流入有限,因此该地区工资率的上升将高于永久外生冲击带来的工资率上升。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工资率的灵活度在流动性不同的劳动力人群中分布并不均匀,缺乏流动性的劳动力工资具有更高的弹性。

Blanchard and Katz(1992)通过分析美国各州的就业人口增长率、失业率的动态路径,进一步研究了美国区域劳动力市场(州)在外部负面冲击之后的调整机制。他们发现,外生冲击对就业增长率有着持久的影响,而对失业率则只有短期的影响。而且,当一个负面冲击发生时,劳动力流动是区域劳动力市场重新回到均衡的主要调整机制,而促使劳动力迁移的主要原因是失业率的上升,而不是当地工资的下降。他们的发现也支持了Barro and Sala-i-Martin(1991, 1992)的结论。

Borjas(2001)研究了最具有流动性的移民群体对美国州际间工资差距的

影响。他指出移民作为自由选择的群体，进入美国后再迁移的成本低、流动性大，比美国本土人对区域间的工资差距更为敏感，因此他们的流动对于缩小区域间的工资差距具有显著的作用。Borjas 研究发现，移民加速了区域间工资收敛的速度，需要 17.3 年便可消除 50% 的区域间的工资差距，而且移民对美国本土经济的贡献也比以前的经验研究要高得多。

就目前中国的现状而言，区域劳动力市场经济学对于我们分析中国的区域劳动力市场至少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第一，中国各地区要素禀赋结构不同，改革步伐不一致，造成了各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和教育回报的巨大差距。但是劳动力自由流动在理论上可以缩小工资差距。如果没有出现收敛，我们则可以进一步分析哪些因素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比如户籍制度、住房的商品化程度、养老保险的可携带性以及地方保护等，并且由此我们可以提出一般性的政策建议。

第二，Topel 指出了工资弹性在不同流动性的劳动力人群中具有异质性，流动性强的群体的工资弹性比较低，对区域市场的冲击的敏感性不如流动性弱的群体，因此流动性强的群体的工资水平取决于地理上更广阔的市场。Borjas (2001) 提出流动性较高的移民对于促进地区间工资收敛具有显著的作用，这说明在这一群体内的工资差距相对较小，或者说收敛速度较快。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检验中国区域间流动性程度不同的群体的工资收敛状况，来验证劳动力迁移是否是区域间工资调整的机制。

第三，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较高学历和技术水平的人，由于获取信息的能力强，因此流动性比较大，而中国劳动力流动主要体现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民工上。本文的研究发现，各地区间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工人工资的收敛速度是受教育水平较高工人的两倍左右。收敛速度的差异间接反映了不同教育水平的群体的流动性程度，也就是说，不同教育水平的群体在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中所受到的流动约束是不同的。这些实证结果对进一步改革中国劳动力市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强调政策应该具有针对性。受此启发，我们根据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工人区域间工资缺乏收敛的事实，提出了建立高校毕业生全国统一就业市场的对策。

三、数 据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社科院和西方学者合作的 1988 年和 1995 年的两次城市住户调查（见 Riskin *et al.*, 2001）。两年间的样本和问卷设计具有可比性。1988 年调查包括 9009 家城市住户，涵盖了 10 个省份，1995 年增加了四川省，包括 6931 家城市住户。为了保证可比性，我们采用两次调查都覆盖的 10 个省份，放弃了四川省。在本文采用的样本中，1988 年包含 17074 个个体，1995 年包含 9627 个个体。这些个体是企业或单位的长期职工和长期

合同工；我们排除了退休职工、学生、临时工、私有企业主和个体户，他们的收入与具有稳定职位的职工缺乏可比性。

我们定义的收入包括所有类型的工资：基本工资、浮动工资、合同工资、加班费、奖金和兼职收入，以及津贴、辛劳补助和其他收入。虽然关于收入的纪录比较丰富，但并不理想。比如，问卷并没有包括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的价值，而且，企业提供住房并没有作为收入计算在内。在本文中，我们采用月度收入作为衡量收入的指标。

表1描述了我们所选样本中分省工人的月度收入分布状况。第(1)和第(5)列列出了按照1988年的不变价格计算并根据国家消费价格指数调整之后的真实收入。七年中平均收入从1927元上升到2812元，增加了45.9%。表1显示各省之间的工资差异很大，而且这一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大。1988年收入最高的广东省人均月度收入比收入最低的河南省高80%；到了1995年，收入最高的广东省和收入最低的甘肃省相比，差距扩大到了144%。

表1 分省样本分布和工人的真实收入

| | 1988年 | | | | 1995年 | | | | 1988—1995年 |
|-----|----------------|---------------------|-----------------|------------------|----------------|---------------------|-----------------|------------------|---------------------|
| | 月度平均收入 (1) | 调整后的 月度收入 (2) | 城市 个数 (3) | 劳动者 人数 (4) | 月度平均收入 (5) | 调整后的 月度收入 (6) | 城市 个数 (7) | 劳动者 人数 (8) | 面板数据 城市个数 (9) |
| 全样本 | 1927 (1034) | 1827 (912) | 67 | 17074 | 2812 (1712) | 2574 (1412) | 62 | 9627 | 29 |
| 北京 | 2052 (734) | 2124 (760) | 1 | 833 | 3797 (1643) | 3383 (1464) | 1 | 802 | 1 |
| 陕西 | 1667 (1220) | 1555 (1138) | 8 | 1830 | 2198 (1119) | 2004 (1021) | 8 | 1032 | 4 |
| 辽宁 | 1844 (618) | 1899 (636) | 4 | 1842 | 2487 (1232) | 2468 (1223) | 4 | 1185 | 3 |
| 江苏 | 1906 (625) | 1887 (619) | 8 | 2231 | 3026 (1472) | 2810 (1367) | 9 | 1199 | 5 |
| 安徽 | 1758 (1061) | 1888 (1140) | 8 | 1693 | 2195 (1098) | 2293 (1148) | 6 | 792 | 3 |
| 河南 | 1555 (709) | 1492 (680) | 8 | 1912 | 2120 (1061) | 2154 (1079) | 8 | 912 | 4 |
| 湖南 | 1767 (728) | 1737 (716) | 9 | 1887 | 2652 (1179) | 2377 (1057) | 7 | 1167 | 0 |
| 广东 | 2800 (1598) | 2039 (1164) | 8 | 1968 | 5089 (3040) | 3844 (2296) | 8 | 869 | 5 |
| 云南 | 2027 (848) | 1931 (807) | 9 | 1765 | 2563 (1082) | 2418 (1021) | 8 | 1079 | 4 |
| 甘肃 | 1907 (1088) | 1906 (1088) | 4 | 1113 | 2084 (927) | 2037 (906) | 3 | 590 | 0 |

注：第(1)列的平均收入以1988年的价格计算，第(5)列中1995年的真实收入是由国家消费价格指数调整产生；第(2)列和第(6)列汇报了根据分省价格指数调整后的按1988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可比收入。括号中的值是标准差。

然而，使用社会消费品价格指数来计算真实工资存在一个问题。即使对同一商品，其价格在不同的省份也可能是不同的，其价格差反映了省际之间的交通成本和贸易障碍 (Brandt and Holz, 2006)。遗憾的是，由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不全，我们无法得到不同年度不同城市商品的可比价格。为了对生活成本进行调整，我们采用了一组 Brandt and Holz (2006) 设计的分地区的价格指数，这一指数是依据一揽子常用商品的价格计算，商品覆盖了 10 大类消费品和服务中的 64 种。表 1 中的第 (2) 和第 (6) 列陈述了根据这一价格指数调整后的按照 1988 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可比平均收入。从整个样本来看，这一调整后的平均收入基本上低于第 (1) 列和第 (5) 列按照国家消费品价格指数调整的平均收入，而且前者的标准差也要小于后者。这一发现支持了如下结论，由于有不可贸易品的存在，不同地区的收入和价格往往成正比相关 (Kravis and Lipsey, 1988)。基于同样的理由，在调整后的数据中，最富和最穷省份的收入之比缩小了：1988 年为 42%，1995 年为 92%。以 1988 年可比价格计算，那两年国家正式职工的平均收入分别是 1747 元和 2413 元，与分地区价格指数调整后的数据接近，但与未调整的数据差距较大。因此，我们以下的分析均采用调整后的数据。

两次城市住户调查覆盖了不同地区多个城市，1988 年包括 67 个城市，1995 年包括 62 个城市。平均来看，在这两次调查中每一城市分别有 255 个和 155 个观测值。表 1 中的最后一列给出了两次调查均覆盖的 29 个城市在不同省份的分布。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构造一个两年的、以城市为单位的面板数据。这些城市分布在中国各地，因此可以把它们看作具有不同制度环境的区域性劳动力市场。这一数据结构允许我们估计不同城市的工人收入和教育回报，从而观察城市间的差异和跨时间的变化。此外，我们利用这一面板数据可以检验这七年间地区劳动力市场的收入收敛情况。

表 2 描述了关键变量的统计特征。表的上半部分是影响收入的个人特征。七年之间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增加了 1.1 年，而工作经验保持稳定。城市住户调查将受教育水平根据学历分成七类。为了估计教育的回报率，必须将这七类转换成相应的受教育年限。根据已有的研究和中国的教育体系，我们进行如下转换：大学及其以上学历定为 16 年，大专和职业技术学校为 14 年，高中 12 年，初中 9 年，小学 6 年，三年及其以上小学水平转换为 4 年，三年以下小学水平为 2 年。根据传统的做法，我们把年龄减去受教育年限和学龄前 6 年，得到相应的工作经验。从其他的个人特征来看，两年中少数民族比例分别占 3.7% 和 4.6%，党员的比例从 24% 上升到了 26.1%。

表2 变量描述

| 变量名 | 1988年 | | 1995年 | |
|------------------|-------|------|-------|------|
| | 均值 | 标准差 | 均值 | 标准差 |
| Log(收入) | 7.4 | 0.4 | 7.7 | 0.7 |
| 劳动者个人特征: | | | | |
| 受教育程度(年) | 10.7 | 2.9 | 11.8 | 2.6 |
| 工作经验(年) | 20.5 | 11.0 | 20.9 | 10.1 |
| 男性劳动者比率 | 52.8 | 49.9 | 53.6 | 49.9 |
| 党员比率 | 24.0 | 42.7 | 26.1 | 43.9 |
| 少数民族比率 | 3.7 | 18.9 | 4.6 | 21.0 |
| 城市经济环境: | | | | |
| 受过初中以上教育的职工比率 | 49.3 | 50.0 | 66.2 | 47.3 |
| 国营和地方公有企业职工比例 | 79.4 | 40.4 | 83.3 | 37.3 |
| 开放度(外资与合资企业职工比率) | 0.3 | 5.4 | 0.8 | 8.9 |
| 通过市场渠道找到工作的比率 | — | | 13.0 | 33.6 |
| 信息设施(家庭拥有电话的比率) | 4.9 | 21.7 | 41.8 | 49.3 |

表2的下半部分列出了影响区域劳动力市场工资结构和教育回报的城市经济环境的指标。这些指标揭示了七年间中国区域劳动力市场的一些特征。我们利用有初中以上学历的工人占劳动力的比例来衡量技术工人的供给,这一比例从1988年的49.3%上升到了1995年的66.2%。同时,尽管1995年在外资和合资企业就职的工人比例仍然很低,但这一比例几乎是1988年的三倍。以安装电话的家庭比例作为衡量基础设施的指标,该比例从4.9%上升到了41.8%。另一个表明劳动力市场开放程度的变量是工人是否通过市场化的渠道寻找工作。在1995年,有13%的职工是通过非公共机构靠自己找到了工作。遗憾的是,1988年的调查没有收集这一显示区域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的指标。

四、工资结构和教育回报

(一) 计量模型

明瑟方程被广泛应用于估计人力资本和收入之间的关系。我们采用以下明瑟函数的一个扩展作为估计教育回报的基本模型。

$$\log Y_i = \beta_0 + \beta_1 S_i + \beta_2 E_i + \beta_3 E_i^2 + \sum_{j=1}^3 \gamma_j X_{ij} + \mu_i, \quad (1)$$

其中 Y_i 是工人 i 的月收入, S_i 是教育程度, E_i 是工作经验, E_i^2 是工作经验的平方项, μ_i 是扰动项, $E(\mu_i) = 0$ 。变量 X_{ij} 代表影响个人收入的其他三个指标: 性别、党员和少数民族。

在方程(1)中, β_1 衡量了整个样本平均的教育回报。经典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有利于提高个人收入, 因此我们预期 $\beta_1 > 0$ 。常常与工作经验相联系的工作培训, 应该和收入有正相关的关系, 因此我们预期 $\beta_2 > 0$; 如果工作经验报酬边际递减, 那么 $\beta_3 < 0$ 。其他变量诸如性别、党员和民族可能对收入也有独立于教育的作用, 但如果这些变量与教育相关, 将它们包含在方程(1)当中则会系统性地改变对 β_1 的估计。

最小二乘法被广泛应用于估计人力资本回报的计量模型。但是由于最小二乘法忽略了个人能力变量, 而个人能力与教育程度有正相关的关系, 因此估计的教育回报率可能有偏。传统上有三种办法来处理这种遗漏变量产生的偏差: 工具变量、固定效应模型、直接衡量能力(参见 Card, 1999)。但是以上三种办法都对数据的要求非常高。

我们承认上述计量上的问题非常重要, 但是由于城镇住户调查没有足够系统的数据可以让我们矫正遗漏能力变量导致的偏差, 因此我们仍然采用最小二乘法。同时, 由于这两次调查所涉及的被调查者一般是在 1978 年改革前接受教育, 而改革前的教育体系非常僵化, 个人几乎没有根据自身比较优势选择受教育程度的自由, 因此选择性偏差的问题对这一群体可能并不严重。而且, 由于大多数对转型国家的教育回报率的研究并没有控制遗漏能力变量导致的偏差, 因此采用最小二乘法可以与这些已有的研究进行比较。

方程(1)暗含着两个假设, 即普通劳动力的收入, 也就是方程的截距项, 和教育回报率在不同城市间都是相同的。虽然方程(1)能够给出整个样本的平均教育回报, 但是接下来的数据分析显著地拒绝了上述两个假设。为了放松这两个约束, 使得普通劳动力的收入和教育回报在城际之间有差异, 我们采用更加灵活的模型:

$$\log Y_i = \sum_{k=1}^n \beta_{ek} D_{ik} + \sum_{k=1}^n \beta_{sk} S_{ik} D_{ik} + \beta_2 E_i + \beta_3 E_i^2 + \sum_{j=1}^3 \gamma_j X_{ij} + \mu_i, \quad (2)$$

这里 β_{ek} 是城市 k 中普通劳动力的对数化收入³, β_{sk} 是城市 k 的教育回报率, D_{ik} 是表示观察值所属城市的虚拟变量, 如果工人 i 在城市 k , 则 $D_{ik} = 1$, 反之 $D_{ik} = 0$ 。因此, 方程(2)可以为 1988 年和 1995 年分别估计 67 个和 62 个城市水平的参数: 各个城市的普通劳动力的收入和教育回报率。我们将使用这些估计得到的参数来看工资结构和教育回报率的城际间差异和动态变化特征。

(二) 计量结果

表 3 列出了明瑟收入方程的估计结果。第 (1)、(2)、(4) 和 (5) 列汇

³ 本文中, 普通劳动力的对数化收入是指剔除教育回报率和经验收益后的收入。因此, 这个收入可以理解为教育与经验为零的基本劳动收入。

报了方程(1)的估计结果:所有城市的平均教育回报率和其他个人特征对收入的影响。第(3)和第(6)列估算了不同城市普通劳动力的收入和教育回报率,但我们并没有在表中直接给出这 $258(=67 \times 2 + 62 \times 2)$ 个估计值;在之后的研究中,我们会仔细分析这些估计值。因为个体观察值分别来自不同群体,如家庭和不同所有制企业,因此可能存在异方差。我们所有的回归都使用了 Huber-White 标准差来去除异方差的影响。非常高的 F 值拒绝了所有参数为零的假设。

表3 明瑟收入方程的估计

| 解释变量 | 1988年 | | | 1995年 | | |
|----------|---------------------|---------------------|---------------------|---------------------|---------------------|---------------------|
| | (1) | (2) | (3) | (4) | (5) | (6) |
| 教育 | 0.0389 (0.0010) | 0.0323 (0.0010) | — | 0.0718 (0.0029) | 0.0606 (0.0031) | — |
| 教育×城市 | — | — | 有 | — | — | 有 |
| 工作经验 | 0.0418 (0.0013) | 0.0414 (0.0014) | 0.0446 (0.0020) | 0.0753 (0.0037) | 0.0745 (0.0038) | 0.0700 (0.0037) |
| 工作经验的平方项 | -0.0005 (0.0000) | -0.0006 (0.0000) | -0.0006 (0.0000) | -0.0014 (0.0001) | -0.0015 (0.0001) | -0.0014 (0.0001) |
| 男性 | — | 0.0969 (0.0061) | 0.1109 (0.0074) | — | 0.1569 (0.0141) | 0.1647 (0.0133) |
| 党员 | — | 0.0772 (0.0068) | 0.0828 (0.0082) | — | 0.1125 (0.0160) | 0.1309 (0.0153) |
| 少数民族 | — | 0.0105 (0.0135) | 0.0431 (0.0232) | — | -0.0472 (0.0302) | -0.0193 (0.0336) |
| 城市的虚拟变量 | — | — | 有 | — | — | 有 |
| 常数项 | 6.4296 (0.0184) | 6.4591 (0.0192) | — | 6.0116 (0.0520) | 6.0801 (0.0548) | — |
| R^2 | 0.2690 | 0.2886 | 0.4072 | 0.1553 | 0.1743 | 0.2991 |
| F 值 | 1520.78 | 942.07 | 72.73 | 391.997 | 248.52 | 32.33 |
| 自由度 | (317033) | (617030) | (13916897) | (39623) | (69620) | (1289498) |

注:括号中的值是 Huber-White 标准差,它可以修正不同形式的异方差。

比较 1988 年和 1995 年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了几个有意思的结论。第一,在这七年间,所有城市的平均教育回报率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从 1988 年的 3.2% 和 3.9% 分别上升到 1995 年的 6.1% 和 7.2%。同时,收入的性别差距从 9.7% 和 11.1% 提高到了 15.7% 和 16.5%。党员与非党员的差距从 7.7% 和 8.3% 上升到了 11.3% 和 13.1%。⁴从整体来看,少数民族工人的收入

⁴ 工作经验的回报率并没有呈现上涨趋势。依据表 2 中汇报的平均工作经验年限计算,经验的回报率的波动范围由 1988 年的 1.68%—2.13% 下降到 1995 年的 1.15%—1.68% (工作经验的平方项为负说明了工作经验报酬的边际递减性质)。这个结果与改革前强调工作经验和改革后强调工作能力的事实是一致的。

与汉族工人的收入没有太大的差异，估计值比较小而且不显著。

以上关于1988年到1995年间教育回报率上升、收入的性别差距扩大和党员回报率结论和已有的研究基本一致。⁵工人个人特征的收益率差距扩大和中国收入不平等急剧上升的事实是紧密相连的。在所有拥有可比数据的国家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收入不平等上升最快（世界银行，1997b；Yang，1999）。工资差距可以被分解为个人特征的不同和个人特征的回报率的差异。因此，我们的研究发现，个人特征回报率的变化是中国在转型中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将性别、党员和民族三个变量加入到我们的基本模型，1988年和1995年的教育回报率就会下降。这说明受教育程度和这些个人特征是相关的。在这两年，教育和男性比例、党员比例有正相关性，1995年，受教育程度与少数民族比例是负相关的。值得注意的是，党员回报率上升的结论，拒绝了经济改革以来政治资本对收入的相对重要性应该下降的假说。我们的发现似乎支持另一种观点：党员的身份是一种有益于职业的投资，它向潜在的雇主发送信号来传递本来不可观测的个人品质，由此提高了个人的收入。

综上所述，从已有的证据来看，由于人力资本的回报率上升、收入性别差距扩大和党员与非党员间的收入差异扩大，中国城市的工资结构趋于发散，而且有更多的工资差异没有被这些解释变量解释，因为 R^2 从1988年到1995年显著地下降了。

虽然方程（1）描述了全国范围内城市住户收入的结构变化，但是它对教育回报率的估计是基于不同地区普通劳动力收入相等和教育回报率相等的假设之上。相关的 F 检验显著地拒绝了这两个假设： F 值在1988年和1995年分别为1.81，6.31和2.00，4.81。因此，我们采用更为灵活的方程（2）来估计不同城市的普通劳动力收入以及教育的回报率。

表4给出了1988年和1995年估计得到的中国城市普通劳动力的对数化收入和教育回报率的分布情况。对比两年的结果可以看出，这些估计值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趋于分散。在这七年间，普通劳动力平均的对数化真实收入从6.36下降到了6.18，因为检验两个均值相等的 t 值为3.21，其差距在统计上是显著的。按城市平均的教育回报率从3.5%上升到了5.4%；检验两个均值相等的 t 值为6.2，说明教育回报率有了显著上升。结合之前党员、性别差异扩大的结论，我们发现在这七年间，城市中平均主义的薪酬制度已经很大程度上被基于个人特征的薪酬体制所取代。普通劳动力的收入和教育回报率在城市间的差异扩大了：前者的范围由1988年的（5.64，6.98）扩大到了1995年的（4.73，7.14），而后者的范围也由（0.01，0.07）扩大到

⁵ 如，李实、丁赛（2003），Zhang *et al.*（2005），Gustafsson and Li（2000），Ho *et al.*（2002）。

(-0.02, 0.13)。⁶其他衡量不平等的指标也表现出收入和教育回报差异变大的趋势。在这期间,普通劳动力的对数化收入的标准差、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都翻了一番以上。从这些指标来看,教育回报率的变化情况也大致相同。

表4 城市普通劳动力工资与教育回报率的分布

| | Log(普通劳动力工资) | | 教育回报率 | |
|--------|--------------|-------|-------|--------|
| | 1988年 | 1995年 | 1988年 | 1995年 |
| 均值 | 6.357 | 6.180 | 0.035 | 0.054 |
| 最低值 | 5.641 | 4.729 | 0.009 | -0.018 |
| 最高值 | 6.975 | 7.136 | 0.070 | 0.134 |
| 标准差 | 0.230 | 0.482 | 0.012 | 0.029 |
| 变异系数 | 0.036 | 0.078 | 0.343 | 0.542 |
| Gini系数 | 0.020 | 0.043 | 0.191 | 0.302 |
| 城市个数 | 67 | 62 | 67 | 62 |

图1显示了1988年和1995年城市间普通劳动力收入的分布状况。横轴是估计所得的普通劳动力的对数化收入,纵轴是观察得到的各个城市的平均对数化收入。1988年的散点图相对集中在一起,这与当时政府保持各地区收入水平相当的事实是一致的。1995年的散点图的均值比较高,表明在改革中工资已有显著提高;更重要的是,普通劳动力的对数化收入更加分散,产生了区域间的工资差异。进一步分析,散点图向上倾斜说明较高平均收入的城市给缺乏工作经验的非技术工人更高的报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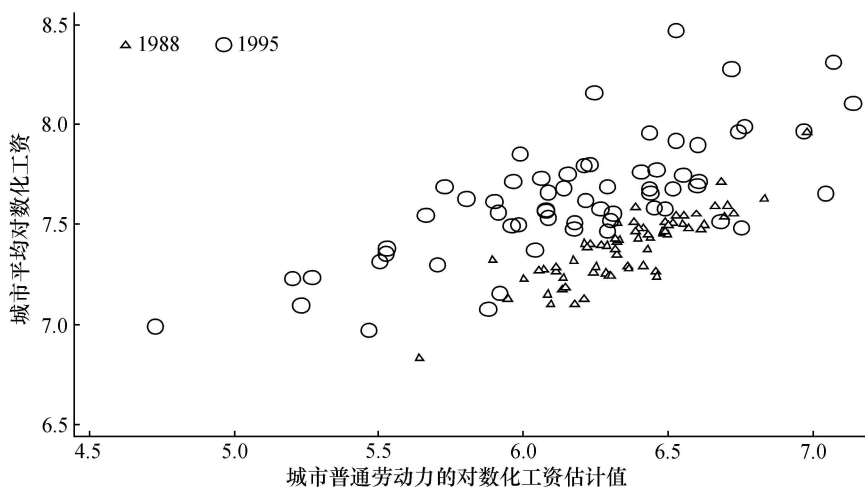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城市1988年与1995年估计所得普通劳动力的对数化工资

图2显示了1988年和1995年不同城市间教育回报率的分散程度。横轴是不同城市的估计的教育回报率,纵轴是观察得到的各个城市的平均对数化

⁶ 在1995年,有两个城市的教育回报率为负值,但在统计上均不显著。

收入。1988年的散点图聚集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而1995年的散点图几乎遍布图2。转型期间这一教育回报率分布的动态变化是与逐渐放宽计划体制下刚性工资的举措是一致的。但是数据并没有显示城市的收入水平和教育回报率的关系。比如1988年，较高的教育回报率同时出现在收入水平高和收入水平低的省份。同样的，在1995年，两者并没有明显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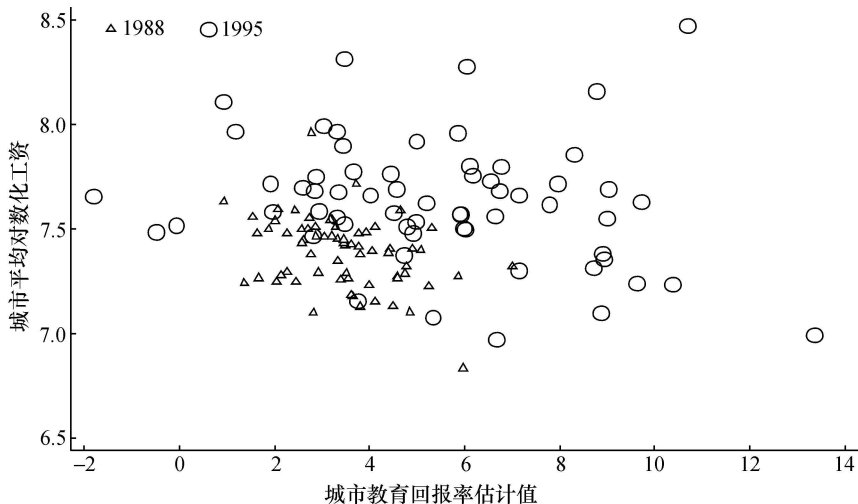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城市1988年与1995年教育回报率的分布情况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各城市间的教育回报率差异是相当惊人的。本文中各城市的教育回报率是使用一致的估计方法和可比的数据计算得到的。1988年和1995年教育回报的变异系数分别为0.343和0.542。Trostel *et al.* (2002)使用微观数据估计了世界上28个国家的教育回报率。因为数据来源的背景不同，包括不同的市场环境和高度隔绝的各国劳动力市场，我们会预料跨国的教育回报率差异会比中国区域间的差异大很多。结果却不是这样，Trostel *et al.* 估算的跨国教育回报率的变异系数大约在0.57和0.59之间，与1995年中国城市间的变异系数大致相同。由此可见，在90年代中期，中国各城市间远远没有实现要素价格均等化。

(三) 收入有否收敛？

在区域劳动经济学的框架内，如果存在市场竞争，并给定劳动力需求不变⁷，职工的自由流动是引发收入收敛、达到高效率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机制。区域间收入和教育回报的差异将吸引劳动力从收入较低的城市迁移到收入较高的城市，因此缩小城市间的收入差距。这一过程会改善劳动力的配置效率，

⁷ 技术进步、投资和产业结构变化等因素都可能影响劳动力需求，但是我们不在本文分析这些因素对局部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使整体经济获益。在美国,劳动力流动和区域间的市场竞争使得相对工资在各州之间稳定地收敛(参见 Barro and Sala-i-Martin, 1991, 1992; Blanchard and Katz, 1992)。这些学者的研究表明,虽然各州工资和收入的收敛速度比较慢,但是非常显著。

由于中国城市间收入差距巨大,如果城市间没有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政策和制度障碍,我们应该可以预料城市间收入收敛的速度很快。为了检验1988—1995年间收入是否收敛,我们采用如下的计量模型:

$$\log w_{k,1995} - \log w_{k,1988} = \alpha + \beta \log w_{k,1988} + \epsilon_k, \quad (3)$$

这里 $w_{k,t}$ 是城市 k 在 t 年的收入, β 是收敛系数。 $\beta < 0$ 说明一个城市的工资增长率与这个城市的初始工资水平存在负相关,即贫穷城市的收入增长比富裕的城市快,城市间的收入趋于收敛。对美国各州之间年度收入收敛的研究发现,收敛系数 β 的基准是 -0.02 左右,也就是说年均 2% 。因此,消除州际之间 50% 的工资差距大概需要 $30-35$ 年。如果中国的区域劳动力市场开始融合,那么我们可以预料在这七年中收敛系数应该显著地小于零。

图3的纵轴画出了1988—1995年29个城市的对数化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横轴是1988年的对数化收入。图中的直线是线性回归得到的拟合线,斜率为 -0.033 , t 值为 -1.03 , R^2 为 0.038 。这些结果显示,尽管收敛系数为负符合我们的期望,但在1988年至1995年间中国的城市之间并没有出现显著的收入收敛趋势。虽然劳动力已经有了迁移的动机,但是导致均衡的机制——劳动力自由流动并没有有效的运作,从而消除巨大的城市间收入差距。这一发现与如下观点是一致的:直到90年代中期劳动力市场仍旧存在限制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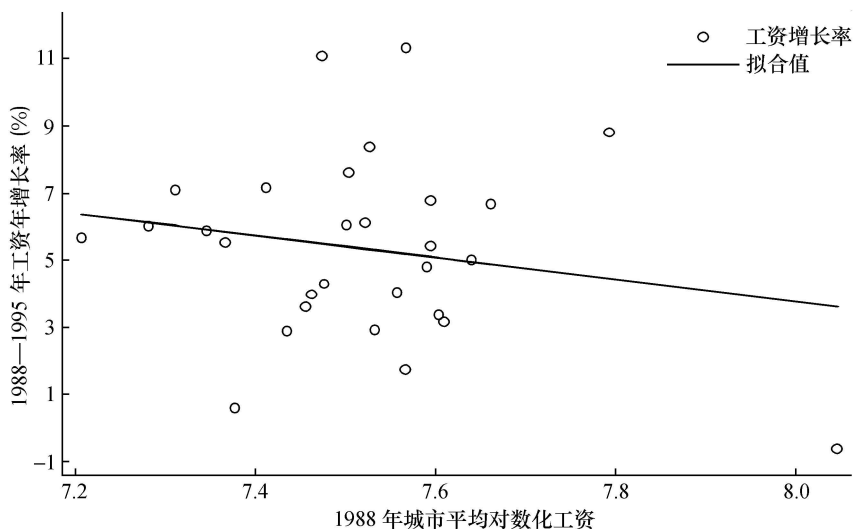


图3 中国城市间的收入收敛状况

动力自由流动的法律和制度障碍，从而阻碍了劳动力在区域间的最优配置。Johnson (2003) 使用统计局的调查数据发现，1990—2000年间中国省际的劳动力迁移率只是同时期美国州际劳动力迁移率的1/4。由于中国区域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显著非均衡状态，一个更具有比较意义的是美国农业劳动力大量向工业转移的时期；那时美国劳动力的迁移率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十倍左右。

继后我们考察了收入收敛速度在不同受教育程度的群体间是否存在差异。我们将劳动力分为四组：最高教育程度分别为小学毕业、初中毕业、高中毕业以及大专以上教育。图4给出了分组的1988—1995年29个城市的对数化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横轴是1988年的对数化收入。我们发现与上述情况相同，收敛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因此并没有很强的证据支持不同区域劳动力市场间所有层次的技术工人收入趋同的现象。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从收敛系数的绝对值来看，最高教育程度为小学毕业的工人收入的收敛速度(-0.073)要显著高于其他三组教育层次的收敛速度(-0.038, -0.039和-0.031)，表明低教育程度工人的收入在城市间的收敛速度更快。虽然从统计上看，这些估计值并不显著，其 t 值分别为1.41, 1.03, 1.39和0.84，但低教育组收敛系数显著性程度较高，已接近于传统的10%显著性水平。这些结果与1988—1995年间大量农民工进城的事实是一致的(参见Fleisher and Yang, 2006; Cai *et al.*, 2004)。换言之，如果农民工在进城打工时系统地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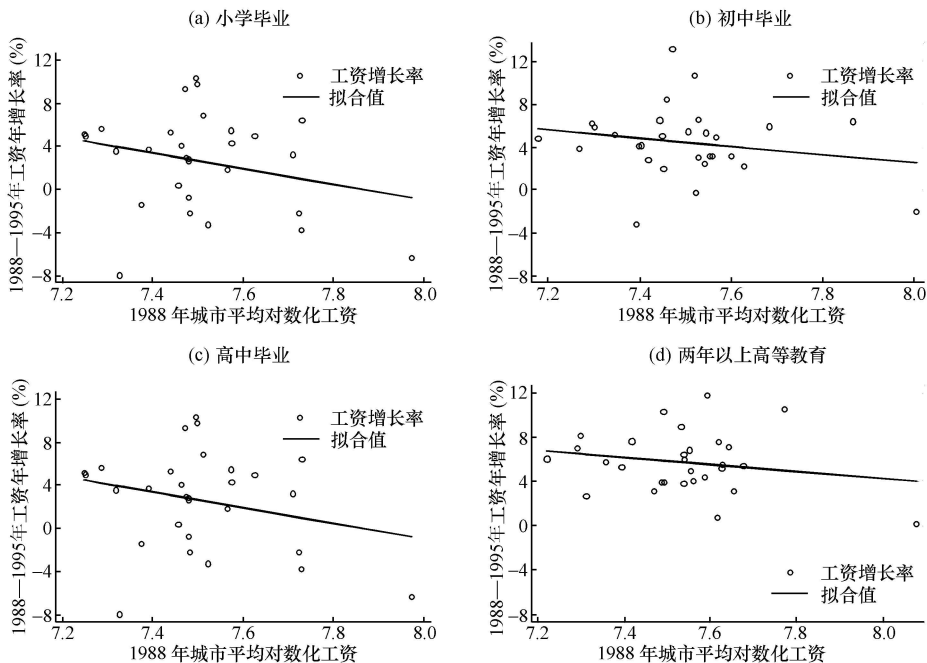


图4 中国城市间按工人受教育程度分组的收入收敛状况

较目的地的收入差距,并做出相应选择,那么农民工进城就会促成低教育工人收入在城际间的收敛。在给定区域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变的前提下,以上实证结果也说明,技术工人在城市间迁移可能遭受到更多的制度障碍。技术工人一般在城市内有比较稳定的工作,因此迁移时需要考虑户口、住房、社会保障和子女受教育的问题;而农民工从农村出来,相对来说这些因素造成的阻碍比较小。

最后需要指出,收入收敛的参数不显著也可能是由于样本量小造成的。我们的分析旨在抛砖引玉,希望更多的学者关注、研究城市间的工资收敛状况。

五、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制度原因和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们的研究发现,在1988—1995年间,中国各城市间的工人收入和教育回报差异扩大了。从理论上讲,工资和教育回报的差异是促使劳动力迅速、大规模自由流动的内在动力,但是事实上这一差异并没有引发显著的工资收敛。同时,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教育回报在改革后虽然增长显著,但是仍然比较低。⁸我们的研究部分地解释了这一现象:直至90年代中期,中国区域劳动力市场之间仍旧存在市场分割,高教育的技术劳动者不能充分自由流动,这种市场扭曲使得人才没有配置到效率最高的地方,因此导致较低的教育回报,而个人则没有充分的动机投资教育。最近的一些调查和研究发现(Fleisher and Yang, 2006; Cai *et al.*, 2004),在过去几年内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功能和效率并没有显著的改进。消除区域劳动力市场分割和教育回报的差异,需要进一步深化劳动力体制改革,我们简要分析这些制度障碍及其背后的动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 继续放宽对户口迁移的限制,就业政策应与户籍制度脱钩

户籍制度作为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计划经济时代是隔绝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主要障碍。改革以来的一系列措施已经有效地降低了户籍制度对劳动力流动性的负面作用。因此,客观地讲,户籍制度本身已经不再是限制劳动力流动的主要障碍,问题在于和户籍制度挂钩的一系列歧视性的就业、社会保障和教育培训等方面的政策。

首先是就业政策的歧视。城市就业政策仍然将本地城市人口的就业问题摆在优先地位。地方劳动局采用各种奖惩手段,鼓励用人单位雇用本地劳动力,限制和排斥外来劳动力。Cai (2003)对北京的户籍制度做过案例研究,

⁸ Psacharopoulos(1994)研究表明世界平均的教育回报率为10.1%,亚洲为9.6%,中低收入国家的教育回报率在11.2%与11.7%之间。

北京市对外地务工人员有严格的数量控制和工种限制，且随着城市就业形势的恶化而趋于加强。在整个90年代后期宏观经济通货紧缩的形势下，北京的劳动就业管理一方面加强下岗情况的统计工作，实施再就业工程，减少下岗；另一方面，更加严格地限制外地民工就业，明确要求企业优先雇用本地劳动力，同时将雇用外地民工与雇用下岗职工挂起钩来。这种歧视性的就业政策使得农民工主要集中于技术要求低、体力劳动为主的行业：如建筑业、制造业和批发零售餐饮服务行业。这与我们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由于受教育水平低的劳动力流动的阻碍比较小，因此城市间非技术工人收入收敛速度较快。

其次是社会保障的歧视。目前城镇居民普遍享受着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和工伤等五项法定保险，而没有户口的外地人口社会保障程度极低。社会保障体系基本上采用属地化管理，大部分社会保障措施都与户籍制度挂钩，因此，从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来看，上述五类社会保障基本上优先照顾拥有当地户口的城镇居民，没有户口的外来人口很难享受和参与到现有的社会保障体制中来。在城市中务工的农民工，基本上没有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也没有养老金，他们只是趁着年轻在城市中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目前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已经开始努力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

再次是教育培训机会的歧视。这一问题不仅表现在外地人口本身教育培训的机会较少，而且突出地表现在流动人口子女的受教育问题，子女的上学问题是流动人口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流动人口子女的辍学、失学、超龄的问题都比较突出。流动人口一般读不起城市公立学校，他们一般选择城市打工子弟学校和家乡的学校。显然，城市义务教育体系排斥流动人口子女的现状，没有缓解这一制约因素，反而严重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户籍制度改革一方面要继续放宽对户口迁移的限制，另一方面需要重点改革与户籍制度挂钩的就业政策、社会保障和教育培训机会。

第一，原则上来讲应该放宽落户的条件，按照稳定的住房、职业或者生活来源给予落户。第二，逐步放松对外来人口就业的职业限制，允许他们从事技术水平更高的职业。外地人口职业的分散化以及允许他们从事技术水平更高的职业，不仅可以吸引高素质的人才进入本地市场，而且可以提高外地人口的收入，将有利于解决社会保障和教育培训方面的歧视，有利于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有利于让外地人口分享教育培训机会。第三，将民办学校合法化，推动各城市兴办民办学校，为外地人口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创造机会，改变他们父母与子女长期分离的局面。

（二）做实个人账户，提高养老金的可携带性

养老保险是影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显然如果职工的养老保险无法在单位之间、区域之间顺利转移，那么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就会很高。养老金在地区之间转移困难，一个原因是各地区养老金管理条例的不一

致,比如目前全国各地单位缴费的标准和养老金的支付水平并不一样。但更重要的是,由于社会统筹账户入不敷出,个人账户的资金常常被挪用来填补养老金的空缺,剩下的缺口则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按比例分担。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职工跨省就业,即使养老金账户实现了转移,资金并没有转移过来。由于账户已经迁出,迁出地政府不愿为其支付养老金,而迁入所在地的政府则因为需要负责其全部养老金而加重其财政负担,故也不愿意支付。因此目前的养老保险基本是各省区各自为政,在省际实现养老金的转移还是颇为困难的。

要提高养老金的可转移性,一个办法是继续提高统筹的层次,建立全国统筹的养老保险体系,在全国层面上实现现收现支,由中央政府负责缺口。但是由于养老金缺口庞大,同时随着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让中央政府独自承担恐怕难以为继。如果让地方政府参与,由于各省财政实力差异悬殊和养老金缺口不同,省级统筹比全国统筹更容易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因此恐怕难以实现全国统筹。目前来看,要提高养老金的可转移性,首先要做的和能做的则是做实个人账户,允许个人账户转移的同时有资金转移。2005年出台的《决定》强调做实个人账户,目的是解决个人空账运行的问题,但如何在做实个人账户的同时,提高养老金在区域间的转移性,则需要更多具体的政策,如全国统一的个人账户。其次,在做实个人账户并允许转移的基础上,再来考虑解决社会统筹账户的转移,可以根据各省不同的缴费水平和支付水平,将职工在迁出地的社会统筹账户的资金折算成迁入地的社会统筹账户资金。最后,要拓宽养老金的投资渠道,使得养老金有较高的回报率,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参加养老保险,从而缩小养老金的缺口,加快积累的速度。

(三) 进一步推进住房改革,将流动人口的住房需求纳入改革日程之中

住房改革是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先决条件。因为如果没有市场化的房地产出售和出租,职工无法轻易地与为他提供住房的工作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因此跳槽将是非常困难的。目前住房改革解除了职工长期依赖企业提供住房的状况,而且大幅度地提高了人均居住面积,但是住房对于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仍然存在。这主要体现在拥有户籍的城市居民和没有户籍的流动人口的住房的选择集合是有明显界限的。住房改革之后的城市居民在购买房屋时至少有三种选择:以市场价格购买拥有完整产权的商品房、以市场价格租房或者以较低的价格购买产权不完整的经济适用房(Wang and Murie, 2000)。很多城市居民倾向于第三种选择,中央政府也积极鼓励地方政府兴建经济适用房,为中低收入的家庭提供住房。由于户籍制度的原因,流动人口基本上还是为主流的住房体制所排斥。吴维平、王汉生(2002)调查了京沪两地的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发现流动人口有限的住房选择包

括：企业提供的宿舍、租房、工棚、自购商品房。比例最高的住房选择是租房和工棚。住房改革的歧视性并不仅仅体现在住房选择上，也体现在城市居民和流动人口的居住条件上。流动人口的住房狭小、拥挤不堪、缺水少厕。根据吴维平、王汉生（2002）的调查显示，京沪两地流动人口的人均住房面积是城市居民的三分之一。虽然住房改革允许外地人口购买商品房，但由于商品房的价格很高，超出了绝大部分流动人口的承受能力，流动人口很难从市场化的住房改革中获益。

大部分的流动人口都认为住房是他们在城市中常住的最大困难。因此住房事实上已成为劳动力流动的巨大障碍。然而现有的城市住房改革一直忽视了流动人口的住房需求，将他们排斥在住房体系改革之外。这一做法无疑是不利于劳动力在区域间的自由流动的。今后的城市流动人口管理法规应该着力于改善流动人口的生活状况。住房改革不应该将流动人口排斥在外，政府的安居工程应该将流动人口的住房需求考虑在内，允许流动人口申请廉租房，用于交换低廉价格的旧单元房的二级房屋市场应向流动人口开放；一些以前只针对当地居民的工作和教育培训机会应向流动人口敞开大门；尝试建立流动人口的住房公积金制度。

六、一个可行建议：建立高校毕业生 全国统一就业市场

本文第二部分关于区域劳动力市场研究的文献研究表明劳动力自由流动是促进区域劳动力工资和教育回报收敛的均衡机制，而 Borjas（2001）研究说明，一部分对区域间工资差异比较敏感的人群能够自由流动就能有效地促进区域间工资收敛。从我们的实证研究结果来看，受教育水平低的职工工资收敛速度较快和大量民工进城的事实是一致的，这也说明了流动中的民工作为均衡的动力，促进了区域间技术水平低的工人的工资收敛。我们的研究也发现受教育水平较高的职工工资收敛速度比较慢，因此如果存在一支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均衡的力量，可能将有效地促进这一教育水平的职工的收入收敛并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效率。在中国目前的劳动力市场上，恰恰存在着这么一支队伍，他们受教育水平很高，没有太大的迁移成本，但却对市场的工资差异最为敏感，而且他们的规模正在逐步壮大，这支队伍就是普通高等学校的应届毕业生。拆除户籍的栅栏，使用身份证替代户口本，从而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学生就业市场，不仅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就业率，有利于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效率，而且这种以身份证为核心的新体系可以逐步推广到新增劳动力，并为渐进地在全国范围内取消户籍制度积累经验。

普通高等学校包括本科院校和高职（专科）院校，这些院校的毕业生是中国目前受教育水平最高的群体，同时他们一般都很年轻。美国劳动力经济

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结论是职工的流动性与年龄呈反比关系,年龄越大,流动性越小。从成本来讲,高校毕业生在选择城市就业时,沉没成本相对已就业的年轻人要低,他们没有养老金转移的束缚,也没有住房公积金转移的障碍。从激励的角度来看,年轻人选择在哪个城市立足时,需要考虑的是一生的预期收入,他们未来时间长,对未来的生活更为看重,因此对区域间的工资差异是非常敏感的。从规模上来看,由于自1999年以来的高校扩招,这一群体的规模在迅速上升。教育部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普通高校毕业生从2002年的133.73万人迅速上升到2004年的239.12万人,2006年为413万,可以预计这一增长趋势将保持若干年。

建立全国性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目前主要的障碍在于户籍制度和地方保护。户籍制度的阻碍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西部地区大学毕业生要进入东部地区就业很困难;第二,一旦离开读书所在地城市到其他城市就业,要想返回则非常困难,因此大部分学生会倾向于一次就业先选户口,二次择业,这造成了企业和员工的低效率匹配,也造成了人力资本的极大浪费。

为了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学术界和政府已经认识到要放松户籍制度对应届大学生就业的束缚,逐步开始推动大学生跨地区就业。但是如果改革只是在应届大学生就业这一特殊时点放松户籍约束,一旦他们找到工作,就又进入了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老系统,那么改革的作用将微乎其微,甚至比短期内不放松户籍都严重。因为大学生能够认识到如果不在应届毕业时落实中意城市的户口,将来会更加困难,也就是说购买户口的价格在应届毕业时是最低的,错过了这个机会户口的价格就会上升,因此大学生宁愿专业不对口,宁愿零工资就业,也要拿到中意城市的户口。这样一来,户口成为了应届毕业生就业时最重要的衡量因素,由此必然导致就业匹配效率的下降。

第二个障碍是地方保护。由于高校毕业生越来越多,毕业生就业问题成了各级地方政府的政治任务。各级地方政府为了优先保证本地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要求各个机关和单位尽量优先照顾本地生源,比如,各级政府机关和国有单位的招聘一般都要求本地户口;同时给用人单位在引进人才上分配户口指标,严格控制外地人才的进入。有些地方甚至列出院校名单,不在名单之上的毕业生则很难在该地获得户口或引进指标。

下面从操作层面探讨建立全国统一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

首先,使用身份证替代户口本。身份证与户口本的差异在于前者不带有属地化管理的特点,要消除户籍制度对全国形成统一劳动力市场的阻碍作用,根本之道在于用身份证管理体制取代户籍管理体制。前面的讨论说明对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应届大学毕业生,不能只是在短期内放松户籍制度,而必须以身份证取代户口本,将相关的住房和养老、医疗、教育等社

会保障体制与身份证挂钩，允许住房公积金、养老金在区域间的转移，这样使得大学生出城就业容易，回城就业也不难，从而提高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在城市间的对流，促进劳动力市场的整合和提高工作匹配的效率。户籍制度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由于历史的原因，要解决存量问题很难，但是改革可以从流量着手。我们认为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大学生就业市场可以作为户籍制度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应届大学生作为新增劳动力的一个群体，我们的建议相当于将这部分群体作为试点，以身份证取代户口本，将相关的住房和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体制与身份证挂钩。这一建议与目前各个城市引进人才做法的不同之处在于，人才引进之后就进入了户籍制度为核心的系统，而我们的建议则主张“新人新办法”，对新增就业的大学生尝试采用身份证为核心的系统，这一试点可以为对其他受教育水平高的劳动力放松户籍控制积累经验，未来也可以将试点推广到新增劳动力和全部人口。

其次，改变政府激励机制，消除地方政府实施政策歧视的动机。地方政府优先照顾本地生源主要是为了保证他们的就业率，但是这种做法却不利于本地的经济发展，尤其是会阻碍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才。所以中央政府必须转变衡量地方政府在促进高校毕业生的工作绩效的指标，不能单一地以本地生源就业率为指标，而应该以促进新增就业为目标。地方政府应该取消对企业的户口配额控制，让企业自主招聘员工。

有人会担心，一旦放开户籍制度对大学生的限制，大学生将纷纷涌向大城市，从而造成大城市高失业率。我们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不大。一是雇主仍然会择优录用，不可能雇佣所有的人；二是因为当我们消除了对大城市户口的保护，就减少了户口的含金量，求职者将会有动力到外地去找工作。在20年前，渐渐放开城乡劳动力市场时，也有人担忧会造成城市失业，出现贫民窟，事实上并没有出现这个现象，因为在城市找不到工作，农民工就会回家发展。高素质的劳动力有更大的选择余地，他们不会放弃外地不错的工作，而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流落街头。放开户籍制度之后，出城容易，进城也不难，就会打消毕业生到全国各地就业的隐忧，从而会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效率。

最后，建立全国性的以身份证为核心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刻不容缓。未来十五年是中国“人口红利”时期，之后中国将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因此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新增劳动力的规模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而大学应届毕业生将成为新增劳动力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十一五”期间预计有2500万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需要就业。错过了这一历史机遇，要通过“流量”解决“存量”问题的渐进改革方法将会非常困难。

参考文献

- [1] Barro, R., and X. Sala-i-Martin, "Convergence across States and Regions", *Brookings Paper of Economic Activities*, 1991, (1), 107—158.
- [2] Barro, R., and X. Sala-i-Martin, "Converge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2, 100(2), 223—251.
- [3] Blanchard, O., and L. Katz, "Regional Evolutions", *Brookings Paper of Economic Activities*, 1992, (1), 1—61.
- [4] Brandt, L., and C. Holz, "Spatial Price Differences in China: Estimates and Implicatio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006, 55, 43—86.
- [5] Borjas, G., "Does Immigration Grease the Wheels of the Labor Market?"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001, (1), 69—119.
- [6] 蔡昉、王德文, "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with 劳动贡献", 《经济研究》, 1999 年第 10 期, 第 62—68 页。
- [7] 蔡昉、王德文、都阳, "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区域差距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 2001 年第 2 期, 第 30—37 页。
- [8] Cai, F., A. Park, and Y. Zhao, "The Chinese Labor Market", paper presented at a conference on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Origins, Mechanisms, and Consequences. Pittsburgh, Nov. 2004.
- [9] Cai, F., "Reform of labor policy in China: A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Economy",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28,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003.
- [10] Card, D., "The Causal Effect of Education on Earnings", in Orley A., and C. David (eds.),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Vol. 3A. New York: Elsevier Science, 1999.
- [11] Fleisher, B., and D. Yang, "Problems of China's Rural Labor Markets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 *The Chinese Economy*, 2006, 39(3), 6—25.
- [12] Gustafsson, B., and S. Li,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the Gender Earnings Gap in Urban China",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000, 13(2), 305—329.
- [13] Ho, S., X. Dong, P. Bowles, and F. MacPhail, "Privatization and Enterprise Wage Structures during Transition: Evidence from Rural Industry in China",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2002, 10 (3), 659—688.
- [14] Jian, T., J. Sachs, and A. Warner, "Trends in R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1996, 7(1), 1—21.
- [15] Johnson, G., "Provincial Migration in China in the 1990s",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3, 14 (1), 22—31.
- [16] Kravis, I., and L. Robert, "National Price Levels and the Prices of Tradables and Non-tradabl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8, 78(2), 474—478.
- [17] 李实、丁赛, "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的长期变动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 2003 年第 6 期, 第 58—72 页。
- [18] Li, S., "Housing Tenure and Residential Mobility in Urban China: a Study of Commodity Housing Development in Beijing and Guangzhou", *Urban Affairs Review*, 2003, 38(4), 510—534.
- [19] 林毅夫、蔡昉、李周, "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地区差距分析", 《经济研究》, 1998 年第 6 期, 第 3—10 页。

- [20] 刘强,“中国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分析”,《经济研究》,2001年第6期,第70—77页。
- [21] 吕绍青、张守礼,“流动儿童教育——逐渐进入视野的研究课题”,《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4期。
- [22] Psacharopoulos, G., “Returns to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a Global Update”, *World Development*, 1994, 22(9), 1325—1343.
- [23] Riskin, C., R. Zhao, and S. Li, “Introduction to the Retreat from Equality: Highlights of the Findings”, in: Riskin, C., R. Zhao, and S. Li (eds.), *China's Retreat from Equality: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New York: M. E. Sharpe, 2001.
- [24] Topel, Robert H., “Local Labor Marke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 94 (3, part 2): S111—43.
- [25] Trostel, Philip, Walker, Ian, Woodlley, Paul, “Estimates of the Economic Return to Schooling for 28 Countries”, *Labour Economics*, 2002, 9, 1—16.
- [26] Wang, Y., and A. Murie, “Social and Spatial Implications of Housing Reform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00, 24(2), 397—417.
- [27] World Bank, *China 2020: Sharing Rising Incomes*.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1997a.
- [28] World Bank, *China 2020: Development Challenges in the New Century*.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1997b.
- [29] 吴维平、王汉生,“寄居大都市:京沪两地流动人口住房现状分析”,《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3期,第92—110页。
- [30] Yang, D., “Urban-based Policies and Rising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1999, 89(2), 306—310.
- [31] Yang, D., “Determinants of Schooling Returns during Transition: Evidence from Chinese Citie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5, 33(2), 244—264.
- [32] Zhang, J., Y. Zhao, A. Park, and X. Song, “Economic Returns to Schooling in Urban China: 1988 to 2001”,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5, 33(4), 730—752.
- [33] Zhao, Y., and J. Xu, “China's Urban Pension System: Reforms and Problems”, *Cato Journal*, 2002, 21(3), 395—414.

Wages and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Chinese Cities

DENNIS T. YANG

(Virginia Tech and Tsinghua University)

LIUGANG SHENG

(Virginia Tech)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1988 and 1995 data from a national household survey to document wages and returns to education for a large number of cities during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Between these two years, average real wages and returns to education increased, yet their spatial dispersions across cities widened dramatically. Although there was no sign of

significant wage convergence in Chinese cities during this period, the wage convergence rate of non-skilled labor is higher than that of skilled labor. Based on these empirical results, we propose to set up an integrated national labor market for college graduates.

JEL Classification J31, O15, P21